

战国文字通论

(订补)

何琳仪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何琳仪 著

战国文字通论（订补）

江苏教育出版社

书 名 战国文字通论(订补)
作 者 何琳仪
责任编辑 戎文敏
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厂 址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邮编:211523)
电 话 025-7570426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7
插 页 1
字 数 595 000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43-4968-0/G·4663
定 价 95.00 元
邮购电话 025-5400774,8008289797
批发电话 025-3249327,3249091
盗版举报 025-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邮购免收邮费,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再 序

李学勤

我应何琳仪教授之邀，为他的《战国文字通论》一书的初版作序，时间是在 1987 年的冬天。这部专著于 1989 年由中华书局印行，很受学者们的欢迎。荏苒至今，不觉已经十多年了。

这期间，中国正经历不平凡的变革，科学事业的各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中国古文字学，伴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成绩也很彰著，而在古文字学的几个分支里，战国文字研究的前进尤其突出。

学科的分支化，是其发展的一项重要标志。例如现代的物理学，按照通行的《学科专业目录》，就分为理论物理、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原子与分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声学、光学、无线电物理等分支。中国古文字学的发展史也是这样，陆续形成了甲骨文研究、金文研究、简帛研究等独立的分支。战国文字研究的兴起是比较晚的，但其成为一种新的分支却相当快速，确定了自己的领域和方法，积累起自己的材料与文献，随之专门的学者队伍也组织起来。

《战国文字通论》的初版，对这一学科分支的早期成果做了综合总结。因此，我在那时写的序言中曾说，该书的出版，“在这一分支学科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件大事，必将促进学科的深入发展，有利于中国古文字学的进步”。

如果说战国文字研究在当时还处于成长的阶段，作为学科分支没有为大家充分认识的话，在今天，这一学科分支可以说业已臻于成熟了。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文字研究本身又在进一步分支化。

《战国文字通论》已依据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战国文字划分为齐、燕、晋、楚、秦五系。这五系文字，都有专门的论作发表，但因为各系已发现材料数量并不均衡，有的系的研究进展特快，已显露建立为分支的趋势。

首先表现这种倾向的，是秦文字。早自王国维先生，即以西土的秦文字与东土的六国古文相区别。近年有学者集中辑录秦文字材料，云梦睡虎地的秦简也有文字编问世。日前传来讯息，湖南龙山里耶新出秦简，竟多达约两万支，这无疑会大为开拓我们对秦文字的眼界。

同样重要而更需要研究精力的，是楚文字。1933年发现的寿县李三孤堆楚金文，1942年发现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50年代开始出土的楚竹简，已使楚文字跃为学者论析的焦点。前些年新出的荆门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简，更确立了楚文字的重要地位。今天研究六国文字，不得不先从楚文字入手。和秦文字得到重点研究一样，楚文字研究也趋于专门化。

这一类征象表明，战国文字研究有很多新内涵，有待再加综合总结。何琳仪教授在此时增订再版他的《战国文字通论》，正是适应了这样的需要。

何琳仪教授一直在战国文字研究的前沿辛勤工作。1998年，他出版了厚1600页的《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这部巨作不妨说是战国文字的一次普查，处处显示出作者的深厚功底与敏锐识见。书内许多观点，同《战国文字通论》相通，读者如能合观，必能有左右逢源的感受。

2002年7月16日

序 言

李学勤

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叙，描述战国时期“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调，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清段玉裁注云，所谓“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即“各用其方俗语言，用其私意省改之文字也。言语异声则音韵歧，文字异形则体制惑，车同轨，书同文之盛于是乎变矣”。按子思著《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是春秋晚期文字尚能维持大体一致，至战国时歧异始形显著，为一大变。秦兼并六国，以秦文字为标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又为一大变。由此看来，战国文字在中国文字演变史上自成段落，应当专门加以研究。

北宋以来学者重视青铜器铭文，所指主要是商代晚期至春秋的文字。清末甲骨文发现，商代文字研究更为兴盛。战国文字，由于材料繁多分散，且少长篇巨制，历来不为学者所重；加以战国文字有其本身种种特点，虽有著作涉及，每每难于掌握其间规律，在释读上造成许多误解，以讹传讹，历久不改。这不仅影响着对文字演变的通盘了解，而且对古代历史文化的探索也有不小妨碍。战国文字作为系统研究的对象，是在五十年代开始的，二十多年间发展迅速，迄今已形成中国古文字学的一个独立分支。

战国文字研究发展的标志是：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了一批专心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各届年会都有战国文字研究的论文提出。在研究生培养上，也有了以战国文字研究作为专业方向或者论文主题的。随着近年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新的战国文字材料大量出现，实际工作迫切要求有关研究成果的传布普及，从各方面看，对战国文字研究的丰富收获进行总结综合，现在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何琳仪同志这部《战国文字通论》正好满足了大家的希望和要求。

何琳仪同志从学于古文字学界前辈于省吾先生，取得学位后，在吉林大学讲授战国文字。他在古文字学方面有深厚基础，因而论述战国文字，能由古文字流变全局着眼。《通论》一书有两点优长，是特别值得向读者推荐的：

第一，是博采众说，去取矜慎。如前所言，战国文字材料本多琐碎，考释论著为数颇多，两者都不便蒐集，读者苦于难观其全。《通论》篇幅虽属有限，但已将各家成说尽可能搜罗在内，予以系统化。书中特别注意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包括一些刚刚发表的，也已收入融会。

吸收已有成果，贵在有所别择。任何学科，尤其是像战国文字研究这样成形不久，

正处在发展时期的分支学科，学者间难免有若干争论，新说也必然有不能成立者。本书不狃于旧说，亦不惑于新义。例如几年前我曾写一小文，论及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江陵地名的战国官玺，何琳仪同志取文中释地部分，而芟除所释未妥部分，甚为允当，值得感谢。

第二，是推陈出新，多有创见。本书虽然是一部《通论》，首先侧重于综述，而各章节中实含有作者精心研究的新获，不少即在举例之间，请读者不要忽视。以下试选数例聊见一斑。

燕国长条形玺，多有“𠂔”字，前人多置不释。或释为“𠂔”，读为节，亦嫌未妥。《通论》由于省吾先生释甲骨文“𠂔”字出发，释此字为“𠂔”，读为符，是新颖的见解。此例一。

赵国相邦春平侯等钺，刻铭有时有“左右伐器”之词，旧多不识，或识之而不知所云。《通论》引《楚辞·天问》及注，指出“伐器”犹言兵器，解决了这一疑难。此例二。

江苏盱眙南窖庄出土铜壶，曾经几位学者讨论，铭文释读逐渐明晰。其中有“重金某某”四字，后两字就是“络壶”，壶字之释，是由于认为该字是器名，实不妥当。《通论》改释为“络裹”，可读为“络镶”，与此器有镂空铜丝网套及错金，镶嵌绿松石吻合。此例三。

河北平山出土中山王方壶，铭文有“𠂔”，即绝字，字从刀作。《通论》引孔广居《说文疑疑》说，指出前人预见这一点。此例四。

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楚简，有“[相] 附如会，相保如介”之语，《通论》说明附、会、保、介意义相关，如为连词。按《大戴礼记·文王宫人篇》“志殷如浚（深），其气宽以柔，其色俭而不谄”，如字用法正与此同。此例五。

这五个例子不过是随手拈来，书中还有许多新见解。各章所论战国文字变化规律，更是富于启发性，对读者有很大帮助。

《战国文字通论》的出版，在这一分支学科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件大事，必将促进学科的深入发展，有利于中国古文字学的进步。蒙琳仪同志叫我写几句话，我是极感荣幸的。所说容有不当，请琳仪同志和大家指正。

1987年11月

目 录

再序	李学勤
序言	李学勤
第一章 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1
第一节 引言	1
第二节 古代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3
第三节 近代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6
第四节 现代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11
第五节 战国文字的分类	25
第六节 小结	33
第二章 战国文字与传钞古文	34
第一节 引言	34
第二节 籀文	34
第三节 《说文》古文	41
第四节 三体石经古文	58
第五节 《汗简》和《古文四声韵》古文	69
第六节 小结	83
第三章 战国文字分域概述	85
第一节 引言	85
第二节 齐系文字	86
第三节 燕系文字	101
第四节 晋系文字	115
第五节 楚系文字	148
第六节 秦系文字	179
第七节 小结	199
第四章 战国文字形体演变	202
第一节 引言	202
第二节 简化	202

第三节 繁化·····	213
第四节 异化·····	226
第五节 同化·····	249
第六节 特殊符号·····	252
第七节 小结·····	264
第五章 战国文字释读方法 ·····	266
第一节 引言·····	266
第二节 历史比较·····	269
第三节 异域比较·····	274
第四节 同域比较·····	281
第五节 古文比较·····	285
第六节 谐声分析·····	290
第七节 音义相谐·····	294
第八节 辞例推勘·····	298
第九节 语法分析·····	303
第十节 小结·····	306
余论 ·····	308
引用书刊简称表 ·····	312
后记(一) ·····	316
后记(二) ·····	317
大陆论著目录(徐在国) ·····	319
港澳论著目录(袁国华) ·····	406
台湾论著目录(季旭升) ·····	411
国外论著目录(徐在国) ·····	420

第一章 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第一节 引言

汉语古文字，顾名思义是指记录上古汉语的文字，通常特指包括小篆在内的先秦古文字（有些学者主张汉武帝以前的古隶也属于古文字范畴）。近几十年来，古文字学界都倾向于把汉语古文字分为殷商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和战国文字三部分。我们认为，这种三段分期法基本能够反映三段历史时期的文字发展演变过程。

战国文字是汉语古文字的晚期书写形式。从字体而言，战国文字既包括笔画圆转的篆书，也包括笔画方折的古隶；从书写材料而言，战国文字既包括金属、石器、陶器、木器、漆器，也包括丝织品。仅就外在形式观察，战国文字就是一相当复杂的概念。因此，在介绍这种古文字之前首先必须搞清它的范畴。

战国时期的下限，公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年，即公元前 221 年。战国时期的上限则有公元前 481 年（上接《春秋》终年）、公元前 475 年（周元王元年）、公元前 468 年（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 403 年（三家始封诸侯）等异说【1】。

战国文字的使用时间，一般说来应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相对应。然而，不同期古文字的分期决不能如历史年表那样整齐划一（何况上举战国始年已在近 80 年间浮动），其形体也决不会因改朝换代而发生突变。文字的变异总是按照自身的演进规律而发展变化。一般说来，这种发展变化都要经历一段较长的渐变过程。殷代文字演变为西周文字，西周文字演变为春秋文字，春秋文字演变为战国文字，都有其历史、地域、人为诸方面的复杂因素。很难设想，一种古文字在某天早晨会变成另一种古文字。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采取中央集权的威力，罢黜六国古文，推行秦文字，是一场雷厉风行的文字革命，堪称文字学史上仅见的文字“突变”。尽管如此，也不能把秦代小篆开始使用的时间限定为公元前 221 年。因为，前此不久秦国已出现了像新郑虎符那样标准的小篆【2】。而后此几十年的秦汉竹简帛书文字中也时常可以找到六国古文的影子【3】。因此，机械地划分战国文字使用年代的上下限是不够妥当的。

其实，自春秋中期以来，列国文字已开始发生引人瞩目的变异，其形体结构和书写风格都逐渐失去西周文字的特点，而开启战国前期文字的先河。下面试举若干春秋中期以后金文，以之与战国文字相互比较：

屯 𠄎 叔夷𠄎 𠄎 陈纯釜“纯”

國		国差罍		《陶汇》3·1005
合		晋公盃		槁朝鼎
四		邵钟		大梁鼎
吉		徐沈尹钲		《包山》204
乘		邓公乘鼎		鄂君启车节

不难发现二者笔画结构一脉相承，呈现典型的晚周文字风格。至于春秋中期以降的楚系铭文，诸如王子婴次炉、王子申盃等，与战国早期禽章诸器、曾侯乙诸器等风格类似，更是一目了然。而南方楚国，包括吴、越、蔡等国的铜器铭文中的花体字，其春秋之际的界限就更难以掌握了。因此，对战国文字使用时间的上下限，乃至对一种字体的始末予以探讨，只能求其概数，而不宜强指其绝对年代。

基于这种认识，所谓“战国文字”的上下限应是比较宽的。我们认为如春秋末年的侯马盟书(或以为战国初年)以及部分越国、蔡国铜器铭文，乃至年代颇有争议的石鼓文，都可以与战国文字对比研究。同理，秦统一后的若干铜器铭文和简牍文字，也可以与战国文字对比研究。至于时代不宜确指的货币、玺印、陶文等材料，我们也间或采用春秋战国之际和秦统一以后者。这不仅便于文字学方面的比较研究，而且与文字形体“渐变”的规律也是并行不悖的。

总之，我们所讨论的“战国文字”材料并不十分严格地局限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而间有阑入春秋末期和秦统一以后者。大体可以这样说：古文字学中的所谓“战国文字”，是指春秋末年至秦统一以前这段历史时期内，齐、燕、韩、赵、魏、楚、秦等国曾使用过的一种古文字。战国文字在汉字发展史中是上承春秋金文，下启秦汉篆隶的重要环节。

下面就按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顺序，介绍历代战国文字出土和研究的概况。

注 释：

【1】杨 宽《战国史》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2】唐 兰《中国文字学》1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3】李学勤《秦简的古文字学考察》，引《云梦秦简研究》341页，中华书局，1981年；又《新出简帛与楚文化》，引《楚文化新探》3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第二节 古代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一、两汉时期

战国文字材料的首次发现应追溯到两千年前的西汉前期。

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诏令废除秦始皇时期颁行的“挟书律”,许多秦火之余的战国古籍赖以保存下来。例如:河间人颜贞秘藏《孝经》、北平侯张苍所献《左传》、河间献王所得《周礼》等儒家典籍相继发现。不过这一时期轰动一时而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当首推孔子壁中书的发现。

西汉景武之际,鲁恭王在山东曲阜孔子故宅墙壁中意外地获得一批珍贵的儒家典籍。这些典籍书写于竹简之上,其文字与当时通行的隶书迥然不同。后来称这批典籍为“古文经”,其文字为“古文”。其实这是战国文字的首次大规模发现,遗憾的是这一点有意无意地被人们忽视了。“古文经”出现后,立即遭到“今文经”学家的激烈反对。然而也有少数有识之士非常珍视这批新材料,并用以校正当时通行的“今文经”。例如:武帝时学者孔安国得古文《尚书》,则“以今文读之”(《史记·儒林传》),并“以今籀古,隶篆推科斗”(《孔丛子·与从弟书》)。这显然是具体而微地整理和研究古文字。孔安国研究古文《尚书》应是古代研究战国文字的滥觞。成帝“愍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汉书·刘歆传》),乃诏刘向“校中五经秘书”(《汉书·刘向传》)。西汉末年,刘向之子刘歆继父之业负责整理这批“古文”材料时,势必也和孔安国一样,对其文字进行释读和校理。所谓“释读”,是研究任何一种古文字的先行步骤,也是最基础的工作。又据《论衡·正说》记载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也应是先秦“竹书”。延及东汉,研究“古文经”成为一代风气。两汉古文经学家多是古文字学家,如张敞、桑钦、爰礼、扬雄、杜林、卫宏、徐巡、贾逵、许慎等人,均为其中翘楚【1】。这一时期,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东汉文字学大师许慎对战国文字研究的功绩。众所周知,许慎《说文解字》的体例是“叙篆文、合以古籀”(《说文·叙》)。所谓“古籀”多是战国文字的传钞材料,今天已成为释读出土战国文字的重要依据(详第二章)。另外,通过古文、籀文与战国文字及其它传钞材料的比较,还可以丰富我们对战国文字形、音、义诸方面的认识。下面试举几例说明:

1. 《说文》:“𠂔,古文周,从古文及。”“𠂔,古文及,秦刻石及如此。𠂔亦古文及。”关于“周”从“及”,以往学者多有疑惑【2】。检中山王园壶铭之“周”作“𠂔”【3】,中山国十四叶鼎铭之“简”作“𠂔”【4】,《古文四声韵》引《说文》“周”作“𠂔”。凡此证明战国文字中的确有从“及”的“周”。当然,“周”何以从“及”,“及”何以省“又”作“人”形,尚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今后的研究方向应是用新出土的战国文字印证许说,而不是否定或怀疑许说。

2. 《说文》:“𠂔,古文席,从石省。”“𠂔”即“丙”【5】,乃“簞”之古文【6】。

“𠂔”之所从“厂”为形符，“𠂔”乃声符。“厂”，“石”之省，可参九年卫鼎铭之“席”作“𠂔”，望山二号楚简“席”作“𠂔”。《古文四声韵》还保存着“不省”的“席”作“𠂔”。“席”从“石”得声，声韵均合。

3 《说文》：“𠂔，古文伊，从古文死。”案，“𠂔”，从人，死声。伊、死叠韵。望山一号楚简之“死”作“𠂔”【7】，与《说文》古文契合。

4 《说文》：“𠂔，古文𠂔。”战国文字标准形体作“𠂔”（随县简），其所从右旁乃“𠂔”之初文，象“箭”倒置箭袋之形。或作“𠂔”（中山王鼎），其箭杆讹作“女”形，古文遂讹作“𠂔”。子𠂔戈作“𠂔”，可证此讹体亦渊源有自【8】。

许慎对《说文》古籀的解释当然未必尽确，有的结论还相当荒谬。例如：释“为”之古文“𠂔”字“象两母猴相对形”，释“省”之古文“𠂔”字“从少从𠂔”云云。然而通观《说文》有关对古文、籀文的解释，则不难看出许慎对这批不同于小篆的文字相当重视，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对古籀的形体分析，至今在研究战国文字中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之，两汉是研究“古文”的鼎盛时期。古文经学家在研究“古文经”的同时，对其文字的形体也进行研讨。他们研究的对象“古文”，其实就是战国文字。可惜由于“古文经”的亡佚，有关著作都未能流传下来（《说文》除外），今天已无从了解其研究的详情。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魏石经的刊立和汲冢竹书的发现，最值得大书特书。

魏石经刊行于魏曹芳正始年间，所以又名魏正始石经，以区别于汉熹平石经。魏石经碑文每字多载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所以也名三字石经或三体石经。石经古文与《说文》古文的形体十分接近，应是一个系统的文字（详第二章第三节）。魏石经的刊立对“古文”的传播和研究起过积极的作用。今天研究“古文”，除了《说文》古文之外，这批材料最为可靠。因此，石经古文也是释读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证之一。

这时出土的战国文字材料以汲冢竹书最为显赫。西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今河南汲县民不准盗掘战国魏王古墓所得竹简凡75篇，其中包括《周易》、《纪年》、《穆天子传》、《琐语》等16种，约10余万言（《晋书·武帝纪》）。这是继孔子壁中书之后又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与壁中书不同，汲冢竹书发现之时即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太康二年（公元281年），诏令当时著名学者整理这批竹书，写出“隶古定”释文。所谓“隶古定”就是把战国古文写成今隶，这当然属于古文字研究范畴，我们今天尚能看到的《古本竹书纪年》佚文和《穆天子传》，即西晋学者荀勖、和峤、挚虞、卫恒、束皙等人整理这批竹书的部分结晶。另外，卫恒在整理竹书时通过分析同字异形，归纳为数百条，撰《古文官书》一卷【9】。续咸撰《汲冢古文释》十卷。这些都是专门研究古文字的著作，可惜唐宋以后已荡然无存。

汲冢竹书与三体石经也是同一系统的文字（详第二章第三节）。西晋学者在整理汲冢

竹书之时，已有40年前刊立的石经作为“隶古定”依据，显然要方便得多。《穆天子传》不到一年就整理完毕，其它竹书也于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全部编校写定【10】。杜预曾参考这批新出土的材料为《左传》做注。凡此说明汲冢竹书的整理速度和研究成果都相当可观，这与三体石经的刊立和流布不无关系。

但是也必须指出，《纪年》的体例比较接近石经中的《春秋》，用后者常用的文字与前者战国古文参读，其文字障碍不会太多。（《纪年》也偶存古字，如“宋景公癸”与宋公栾戈的“癸”同形，《史记》则作“栾”。）然而《穆天子传》所涉及的人名、地名、草木鱼虫、珍宝异器等文字则相当繁富，远非石经古文所能囊括。今天能见到的《穆天子传》虽是隶定本，然犹存古文。如“时”作“𠂔”（卷一），“寿”作“𠂔”（卷二），“其”作“𠂔”（卷四），“乘”作“𠂔”（卷六）等，均见于战国文字。又如“山陲自出”（卷三），“陲”乃“陵”之古文【11】。其右下两点，乃古“冰”字，为叠加音符。这类形体，也可从散盘“𠂔”、长陵盃“𠂔”等“陵”字中得到验证。又如“左骖赤𧍇，而左白𧍇”（卷四），郭注“𧍇，古义字”【12】。参照郢王𧍇戈“𧍇”作“𧍇”（“羊”旁与“我”旁合书），其上方正从“羊”头。可以推测，竹书原作“儀”，后隶定为“𧍇”。类似的“古文”在《穆天子传》中并不算少，应引起战国文字研究者充分重视。

另外，南齐高帝时在湖北襄阳古墓中发现《考工记》10余简，梁任昉获《尚书》遗篇残简，今均亡佚。

总之，魏晋南北朝期间，以三体石经的刊立和汲冢竹书的发现最为重要。这一时期原始材料和研究成果（如卫恒、续咸等人的著作）未能流传至今，乃是战国文字研究中的憾事。

三、唐宋元明时期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收获是石鼓文和诅楚文的发现。隋唐之际，在秦国故地雍县发现10枚馒头状的石头，上刻韵文10首，这就是著名的石鼓文。因为石鼓文中有几个字与《说文》籀文形体吻合，所以长期以来被误认为周宣王遗物。其实石鼓文乃是战国秦文字（详第三章第六节）。北宋中叶，也是在秦国故地又发现了诅楚文石刻。石鼓文和诅楚文为研究秦始皇以前的秦国文字提供了绝好的材料。

考古材料的发现，往往能开拓人们的视野。以出土文献验证传世文献的方法，一直被古代学者所运用。众所周知，隋初颜之推根据当时出土秦权铭文“乃诏丞相状馆”，纠正了《史记·秦本纪》“丞相隗林”的“林”是“状”之讹（《颜氏家训·书证》）。唐代傅奕根据北齐时发现的《老子》，校订通行本《道德经》等。

宋代，一些战国铜器铭文陆续发现。在宋人金石著作里，战国铭文尚未能从两周金文中分离出来，或系属商代（如者旨於赐钟），或系属夏代（如蔡侯产戈）。以今天铜器断代的水平来衡量，其荒诞自不待言。这时重要的金石著作有：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少数战国铭文在这时被辨识出来。例如：经金石家赵明诚考订的禽章钟，至今仍是楚国铜器铭文断代的标准器。

北宋初年,郭忠恕根据当时尚能见到的“古文”材料,辑成《汗简》。其后,夏竦又在该书基础上增补许多“古文”,辑成《古文四声韵》。这两部书虽然取材较为庞杂,且时有讹误,但从保存传钞古文材料而言,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往学者对这两部书的评价甚低,考古新材料已经证明:《汗简》和《古文四声韵》乃是释读战国文字不可缺少的工具书(详第二章第五节)。

元、明两代,战国文字的材料既无重要发现,搜辑整理方面的工作也鲜有重要成果,故兹从略。

总之,唐代至明代的战国文字资料所获不多,搜辑和整理传钞古文则颇有成绩,这为今天我们研究战国文字提供了某些方便条件。

西汉至明这段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出土战国文字资料的数量和品类都有限,惟独竹简文字资料堪称大宗。古代学者对孔子壁中书、汲冢竹书等竹简曾做过许多整理和研究工作。遗憾的是这些成果与竹书原物均已湮没无闻,经传注疏的“隶古定”及字书中的“古文”亦并非战国文字的本来面貌,我们只能从传钞古文中得其仿佛。因此,对《说文》古文、籀文、三体石经、《汗简》、《古文四声韵》之类的传钞古文资料应倍加珍视。因为古代学者对战国文字的时代缺乏明确的认识,所以可称“古代”为“战国文字研究的蒙昧阶段”。

注 释:

- 【1】王国维《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观堂集林》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2】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3】李学勤、李零《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2期。
- 【4】雍城考古工作队《凤翔县高庄战国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9期。
- 【5】唐 兰《古文字学导论》下编58页,齐鲁书社,1981年。
- 【6】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3.0689—069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0年。
- 【7】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战国楚简研究》(3)17页,1977年。(油印本)
- 【8】朱德熙《朱德熙古文字论集》203页,中华书局,1996年。
- 【9】《古文官书》旧以为汉卫宏著,其实“宏”乃“恒”之误。《尚书大传》“恒山”作“弘山”,元魏避讳“恒农”为“宏农”,均其证。详孙诒让《籀馆述林》卷4.7。
- 【10】朱希祖《汲冢书考》37—43页,中华书局,1957年。
- 【11】《文选·沈休文早发定山诗》注、《太平御览》八均引作“丘陵白出”。
- 【12】通行本“赤”作“亦”,今据《太平御览》896引作“左骖赤骥,而右白义”改。

第三节 近代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一、出土和研究概况

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正处于封建社会学术研究的顶峰阶段。在“朴学”风气的

影响之下,“小学”的附庸“金石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内府编纂的《西清古鉴》和阮元编纂的《积古斋钟鼎款识》,均被收入《皇清经解》,是其重要的标志。

晚清以后出土的战国铭文巨增,较著者有战国早期田齐标准器——陈侯四器。兵器铭文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前代。这一时期的金石著作总总林林,其中多载战国铭文。例如:吴式芬《攷古录金文》、吴大澂《愙斋集古录》、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端方《陶斋吉金录》等。

降至民国,出土战国铭文尤富。最重要的收获是,1928年至1930年间在洛阳金村古墓的发现。墓中所出羈羌钟是战国早期的魏国标准器,刘节、吴其昌、唐兰、温廷敬、郭沫若、徐中舒等学者均有专文考证【1】。该墓还出有若干容器和金银器铭文,则是东周国的标准器【2】。金村古墓所出的这批铜器铭文资料,详见加拿大怀履光《洛阳故城古墓考》【3】、日本梅原末治《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两部著作。另一重要收获是,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出土有铭铜器30余件。其中舍甬诸器的器主是楚幽王熊悍,这为战国晚期楚国铜器铭文树立了可靠的标尺。唐兰、郭沫若、胡光炜、刘节等学者均有专文研究【4】。朱德熙研究战国文字即从寿县所出铜器入手,1947年—1948年间朱氏先后撰写3篇有关寿县铜器的文章【5】,已表现出作者考释战国文字的功力。该铜器群留存在国内者,多收入北京历史博物馆编纂的《楚文物展览图录》。其它新出土战国铭文尚多,兹不备述。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是这一时期集大成的金文总集,其中收录的战国铭文相当丰富,至今仍不失为研究战国兵器铭文的主要资料来源。

晚清以来,传统金石学迅速发展,已渐有独立之势。学科分类的日趋精密,有利于促进在金石学园地里开拓战国文字研究的新领域。在战国文字尚未明确地从旧金石学中分离出来以前,石器、货币、玺印、陶器等文字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已先行展开。下面就简单地介绍铜器铭文以外各种文字的研究概况。

石鼓文和诅楚文的研究,在民国期间颇为兴旺。郭沫若、马叙伦、马衡、唐兰等学者都参加了石鼓文年代的讨论【6】,罗振玉、张政烺、郭沫若等则通篇考释石鼓文【7】,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一书尤为重要。关于诅楚文,容庚、郭沫若等均有专著研究【8】。商承祚《石刻篆文编》则是研究魏晋以前石刻的工具书。

现存最早的货币文字著作是宋代洪遵编写的《泉志》,那时战国货币尚未被人们所认识。货币文字形体简易诡异,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洪荒飘渺的远古或夏代的遗物,有太昊、高阳、黄帝币之说【9】。自乾嘉古钱学家蔡云提出“今所见金币……盖流行于春秋战国”【10】的论断,历史上的种种谬说才得以澄清。有清一代古钱学家对战国货币的整理和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例如:李佐贤《古泉汇》对战国货币出土地点和铸造历史的考证,马昂《货币文字考》、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对战国货币文字的释读,都各具特色。1938年,丁福保编纂《古钱大辞典》,几乎全部收入了当时见于著录的古钱品种。该书附有释文及诸家研究成果,甚便学者。与此同时,日本奥平昌洪编纂了《东亚钱志》,

该书除间收不见于旧钱谱的珍品之外，还采用了近人的考释，颇有参考价值。

玺印文字历代都有发现，明代已出现印谱，但是比较系统地搜辑和整理玺印文字则是从清代开始的。与战国货币相反，战国玺印的时代曾一度被误认为秦汉。乾嘉著名学者程瑶田首先释出“尔”为“私玺”，并指出“玺但用尔者，古文省也”【11】。程氏把战国玺印文字归属于“古文”，见解十分犀利。后来徐同柏索性把古玺称为“古文印”【12】，吴式芬又进一步分出“古玺官印”和“古朱文印”【13】。同治年间，陈介祺荟萃各家印谱编辑《十钟山房印举》，其中古玺的材料十分丰富。该书虽兼收汉以下材料，但是首列“古玺”，又进而先列官玺，后列私玺，这一体例至今仍在沿用。陈氏“朱文铜玺似六国文字，玉印似六国书法近两周者”【14】的推测也颇有见地。光绪年间，吴大澂编纂《说文古籀补》。该书虽以收录金文为主，但兼收古玺 570 余字，其释读间有可采。民国期间，丁佛言的《说文古籀补补》又对吴氏之书有所补充。嗣后出现许多古玺印谱，较重要者有黄濬《尊古斋古玺集林》、方清霖《周秦古玺菁华》等。1930 年，罗福颐《古玺文字徵》出版，收录可识玺文 629 字，这是我国第一部古玺字书。吴幼潜《封泥汇编》收录十几方战国封泥，也是研究玺文的罕见对比材料。

清同治年间，陈介祺开始鉴定和搜辑山东潍县出土的陶文。嗣后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又发现了齐、燕、韩、秦诸国陶文，其中以齐、燕旧地出土量最多。早期研究陶文的学者以陈介祺和吴大澂的贡献最大，但二人的著作多未刊行。吴大澂对陶文研究的部分成果散见于《吴濠斋尺牋》，而《说文古籀补》对陶文的考释不过反映他的部分研究成果而已。民国期间，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强运开《说文古籀三补》均收录陶文。后来顾廷龙《古陶文彙录》不但收录陶文单字，而且附有辞例，体例更为完备，是当时最权威的陶文工具书。这一时期几篇有关陶文研究的论文颇具水平，例如：唐兰考证陶文“陈向”即典籍之“田常”【15】，张政烺考证陶文“陈得”与陈璋壶、子禾子釜铭文的“陈得”实为一人【16】。凡此种种无疑提高了陶文的史料价值。著录陶文的著作主要有：陈介祺《簠斋藏陶》、刘鹗《铁云藏陶》、周进《季木藏陶》（参李零《新编全本季木藏陶》分类考释）等。

1942 年，在湖南长沙古墓出土的楚帛书，是战国文字罕见的缣帛文字材料。楚帛书发现不久即流失国外，国内只有不精确的摹本，研究著作有蔡季襄《晚周缣书考证》。

1883 年，吴大澂草创按《说文》顺序收录古文字的体例，编纂《说文古籀补》。这类古文字字典虽以收录金文为主，但也收录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战国铜器、兵器、货币、玺印、陶器等文字，这为战国文字字形的系统整理奠定了基础。这类字书对战国文字的释读多有可取之处，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上吴大澂、丁佛言、强运开所著三书，就战国文字的考释水平而论，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例如：“莓”（P2）、“登”（P6）、“屎”（P7）、“𠂔”（P11）、“𠂔”（P19）、“𠂔”（P19）、“虞”（P22）、“来”（P25）、“夏”（P25）、“韩”（P25）、“栢”（P26）、“瘳”（P36）、“𠂔”（P37）、“聘”（P51）、“永”（P63）、“𠂔”（P63）、“瘳”（P65）、